

关于“宋韵”阐释的几个问题

刘克敌¹

【摘要】以“宋韵”作为“两宋”文化的代称或者作为“两宋”文化特色的形象概括用语，庶几已为“两宋”文化研究界认同，特别在与“唐风”并举指代唐宋文化之时。正确地阐释“宋韵”，以便让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都理解“宋韵”不仅作为一个审美概念而且作为文化符号，如何最恰当鲜明地体现“两宋”的文化特色，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种理解应该可以用抽象的或形而上的同时又形而下的也就是具体生动的案例展示给世人。如此才有可能让“宋韵”深入人心，并最终获得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共同认同。

【关键词】宋韵 传统文化 审美风格 文化符号

以“宋韵”作为两宋文化的代称，或者作为两宋文化特色的形象概括用语，庶几已为两宋文化研究界认同，特别在与“唐风”并举指代唐宋文化之时。不少浙江学者已对“宋韵”的内涵外延等予以阐释，如姜青青认为：“‘宋韵文化’的概念或可以这样表述：它是‘两宋’文化的精华和精彩所在，是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高尚情操、哲学理念、美学观念、文学造诣、艺术格调、匠心和工匠精神和生活风尚等文化价值，具有积极进取、和谐包容、精致典雅、诗情画意的人文特色，代表了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¹而陶然的理解则和姜青青不尽相同：“‘韵’本为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之一，而宋韵文化之‘韵’则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既包括宋代辉煌的文学艺术之风韵，也涵盖宋代人格气象的神韵，更指向宋代时代精神的气韵。其外延又拓展为从宋代传承至今的文化内涵与底蕴，展现为文学、思想、艺术、礼俗、民情等贴近当代民众生活、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集中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佛道信仰、学术思想、建筑风貌、乡贤名宦、礼俗文化、地域文化等各领域。”²

此外，现有一些阐释“宋韵”的文章在如何理解和阐释“宋韵”方面似乎尚有分歧，有的用来代指整个两宋文化或两宋文明：“宋韵就是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韵味，简单地说，就是指辉煌的‘两宋’文明”，³并以此和其他历史时期进行比较，例如常见的“唐风宋韵”或“汉风宋韵”等。有的只是将“宋韵”理解为一个美学概念，用来概括形容两宋的文化特征，特别是文学艺术特征和审美风格特色。有的则更进一步以“宋韵”代指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比较精致含蓄、内敛低调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两宋时期最为普遍也最有代表性，例如前面引用之姜青青和陶然所言。诚然，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有不同层次认识本属正常，何况学术界对此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但无可否认的是，对这一概念的阐释和认同就地域而言目前还是基本限于浙江文化界和学术界，就研究范围而言也大致限于两宋文化研究界，尚未提升到引起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高度。此外，对这一概念的运用也有不够规范甚至泛用现象，例如认为两宋的一切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都可以用“宋韵”来概括——这显然不利于“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实施，不利于确立两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高峰地位，也不利于浙江传统文化知名度的扩大和历史地位的提高。诚然，从文艺理论视角而言，“宋韵”如果单纯作为对两宋文学风格或文化特色的形象概括说法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要上升到纯粹艺术审美理论和文化理论高度，成为一个规范性的学术概念，则必须在学理上给予严谨且科学的符合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阐释，否则无法获得一个命名的合法性。

在2021年8月31日召开的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在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上不断取得新突破”。⁴《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的意见》更进一步指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和宗教等方面，展现多元包容、百工竞巧、追求卓越、风雅精致的宋韵文化气象。⁵这说明“宋韵”一词已经从一个形象概括用语转化为文艺术语并进而扩展到政治、文化领域，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多样指向性的文化符号或更有象征意味的文化标识，业已承担起弘扬浙江历史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有鉴于此，我认为首先应该对“宋韵”一词进行理论阐释，明确“宋韵”是一个内涵和外延极为丰富的概念，

作者简介：刘克敌，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杭州 311122

对它可以有也必须不同层次的理解和阐释。如何把这个对“两宋”文化的形象概括用语提升为具有真正学理性的学术术语并进而扩展为一个文化符号或文化象征,确定其不同的意义层次和不同的使用范围,其实有很大难度。从最单纯的审美风格概念到文化概念最后上升到一种文化体系或者生活方式的代称,其中每一个层次都值得认真梳理辨析。然后要对“宋韵”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为何“宋韵”产生于宋代而非其他朝代,换句话说就是为何称为“宋韵”而非“明韵”“清韵”?同样是对两宋文化和文艺特色的概括,北宋时期的“宋韵”与南宋时期的“宋韵”又有何异同?造成这些异同的原因是什么,与地域文化和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关系怎样?与这一时期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又有何关联?再就是如何理解“宋韵”所代表的两宋这一历史时期,无论是在文艺发展史意义上还是在中国文化发展史意义上所占有的高峰地位?最后,在今天应该如何正确地阐释“宋韵”,以便让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都理解“宋韵”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或者审美概念如何最恰当最鲜明地体现了两宋的文化特色,这种理解不仅可用抽象的和形而上的同时也有形而下的也就是具体生动的案例成为佐证。如此也只有如此,才可以在不同学术领域和宣传领域进行阐释说明,才有可能让“宋韵”深入人心并最终获得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共同认同。

毋庸讳言,当下人们提及“宋韵”,第一反应就是高雅、精致、内敛和含蓄等这些审美风格或审美趣味范畴之内的描述性术语,而且与代表汉代、唐代文化的“汉风”“唐风”相比,“宋韵”更多给人以阴柔含蓄之美的印象而非阳刚豪放之美,这显然和“宋韵”一词中“韵”这一词汇有关。就词源而言,“韵”最初涵义是指和谐的声音,后转指韵脚、押韵,以后又逐渐转指风雅、高雅和气韵、神韵,并形成一些可以用于人物的常用词汇如“韵致”“风韵”等,如明沈德符《野获编·杜韦》中有“即韦韵致故在,亦憔悴无复人理矣”之语。今人使用“宋韵”一词,显然即是在指“两宋”文化所特有的气韵、风韵和韵致,这些无疑首先属于艺术风格范畴,之后又逐渐将“宋韵”这一说法应用于代指“两宋”文化特色甚至社会生活风貌。至于为何是“宋”韵而非其他朝代之“韵”,则有研究者认为正是在宋代,以“韵”作为评判人物事物的标志日趋广泛普遍,不仅体现在文艺创作特别是宋词中,也用于日常生活人物事件的评判方面。⁶其实,如果追根溯源,则应上溯至《世说新语》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但最早的源头当与《易经》阴阳之道有关。⁷从儒道释角度看,则与道教、佛教对阴柔含蓄之美的肯定有密切关联。至于从政治角度,则与两宋政权政治军事上相对衰弱、统治者重文轻武及所实施的一系列统治政策有关。特别是两宋统治者所采取的相对重视士这一文人群体政策,在提升文人群体进入决策集团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审美情趣更多为统治者和社会大众接受。这方面相关成果甚多,不赘。在此只强调一点,就是相对唐代文人,宋代文人整体的审美趣味较高也较为纯粹:“宋代民族审美之风,实又进于唐代。任就何事观察,皆可见其高尚优美之概,不得谓宋人讲理学,偏于迂腐鄙朴,而薄文艺不屑为也。”⁸而且,于阳刚阴柔之中无疑是更偏重于阴柔、婉约一面,虽有苏、辛等人的豪放派词作,但放在整个宋代文坛却不占主流。至于日常生活,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和统治者偏安一隅贪图享乐的心态,也呈现出日益追求精致、高雅和日趋审美化的趋势,宋瓷即为明证:“它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俗丽,都迥然不同。所有这些,体现出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即追求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成为一代美学风神。”⁹

诚然,如果从审美风格类型看,“宋韵”无疑是偏于阴柔含蓄一面,也是承继发展了中国文化中偏重此一方面的特点。“与从唐经晚唐到北宋的这种艺术发展相吻合,在美学理论上突出来的就是对艺术风格、韵味的追求。所以,不是白居易的诗论,而恰好是司空图的《诗品》,倒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所体现的美学观。……如果说,封建前期的美学代表作如钟嵘《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主要是讲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那末,封建后期的美学代表作如司空图《诗品》和严羽《沧浪诗话》则进了一步,它更讲究艺术作品必须达到某种审美风貌和意境。……文艺中韵味、意境、情趣的讲究,成了美学的中心。”⁹李泽厚的这些论述,说明现代学术界对宋代文艺作品所体现的审美趣味已有基本认同,只是尚未使用“宋韵”这一说法而已。总之,较之唐代,宋代文人这种对纯粹审美趣味的追求虽然偏于柔美和精致,却是宋人在审美方面走向成熟的标志。

此外,有一点以往人们不太注意或者说以往不太公开予以正视的一点就是“两宋”统治者大都喜爱和擅长文艺,且艺术修养较高,“至于北宋诸帝,皆精研美术,士大夫复提倡品茶绘画诸事,故陶瓷工艺,因之尽美极妍。”⁸他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偏好自然对“宋韵”之形成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诚如柳诒徵所言:“提倡美术,殆莫盛于宣和。降及南渡,仍仿宣和故事,置御前画院。”⁸事实上,马克思对此早有论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

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¹⁰ 此处虽然没有明说统治者在审美趣味方面如何引领社会趋势,但从人类历史看这一点毫无疑问。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总之,如上所述,“韵”作为对“两宋”文艺风格或者对文人精神风貌的描述性用语和概括性用语,经由前人和同时代人如苏轼等人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概括,至宋代已得到认同,也就意味着至少在艺术审美和生活美学领域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和学理性。

那么,如何从文化发展史角度理解“宋韵”所代表的两宋文化以及文化特征呢?限于篇幅此处只能简单论述。

所谓“宋韵”,如果从中国文化发展史角度看就是一种富有特色的文化,是继唐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对此王国维、陈寅恪和柳诒徵等都有相关论述,也早为学术界认同,不赘,此处只补充李泽厚的论断:“宋代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¹¹ 如果从中华民族审美理念发展视角看,“宋韵”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审美观念方面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一个民族在审美上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在“两宋”时期,所谓“美”不仅体现为艺术审美,也有生活审美。美的“生活”不仅在“别处”,不仅在艺术之中,而且就在此处,就在当下,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宋韵”所概括的审美风格和情趣,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是艺术和生活的统一,也是“雅”和“俗”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味强调“宋韵”中高雅精致的一面,忽略其生动鲜活富有生活意趣的一面,尤其是在代指通俗文化和社会生活时,显然不够全面。例如两宋时期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学如话本小说、戏剧等,它们显然也属于“宋韵”的有机构成部分。¹²

既然“宋韵”是一个概括两宋文化特征的术语,那么在具体论述北宋时代的“宋韵”和南宋时代的“宋韵”时,既要注意到它们的共同点或一脉相承之处——如都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感色彩等,更要注意其不同点以及各自与时代、社会和地域文化的关系。导致两宋时期“宋韵”文化差异的原因除却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外,所在地域文化的差异恐怕是重要因素,刘师培曾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对此有所论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¹³ 当代学者童庆炳也认为:“地域文化除了与自然环境密切有关外,当然与在此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环境,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等同样密切相关。说明地域风格及其成因,必须把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综合起来考虑。”¹⁴ 仅就南宋时期的“宋韵”而言,较之北宋时期最明显的不同恐怕就是在审美情趣上更追求精致、细腻和含蓄、内敛,在艺术创作格局、构思方面则有意无意忽略整体而重视局部、重视细节,绘画上马远被称为“马一角”即为明证,马远与范宽的区别,不在于绘画技艺方面,而是在画的布局 and 整体格局及气势上已经略逊一筹。至于文学中的婉约一派至南宋在审美风格上则更具阴柔意味,甚至走向消极、颓废。从周邦彦到姜夔,再到吴文英和“永嘉四灵”,他们的词作越来越精致也越来越消极柔弱的演变轨迹十分清晰。对此就连同时代人也看得十分清楚:“绍兴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时士人所做文字极粗,更无委屈柔弱之态,所以亦养得气宇。只看如今,秤斤注两,作两句破头,是多少衰气!”¹⁵ 朱熹此言与韦勒克所言倒是契合之处:“我们应该承认,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我们可以粗略地断定,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是可能的,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又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却不能预言这些艺术形式必然会存在。”¹⁶

至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但不外乎外部原因和内部因素两大方面。

外部原因,除却显而易见的最高统治者统治能力低下、南宋政治军事方面更加羸弱之外,当与临安所在之江南文化和“两浙”文化有关。如果说北宋首都所在地汴京属于中原文化圈,属于内陆文化的话,则临安显然属于这一文化圈的边缘并有自己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南文化,这一地域文化的整体特点就是“水”文化,也是主情、尚文的文化。相对于内陆文化,江南因地理相对偏远,受儒家影响要比中原小一些,在文化个性上也就更为自由、活跃,此外佛教、道教在此传播也更为广泛。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伴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上至君主大臣下至一般士人,都较多沉溺于山水而又感怀故国,其审美趣味自然多偏于惆怅多情的“浅吟低唱”,而南方特有的气候和秀丽自然风光又强化了这一点。就南宋时期的“宋韵”而言,不仅较之北宋时期显然更多融合了江南文化的特色,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文化中“雅”文化的承继也更加突出。同时,由于市民阶层的产生和都市经济的发

展，也受到通俗文化和通俗文学的影响，在追求雅致、精致美学趣味的同时也兼顾了雅俗共赏，这在南宋的话本小说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历史充满了吊诡，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一直较为羸弱直至走向灭亡的宋朝，反而是在文学艺术、文化和学术领域达到高峰，也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的那一段名言：“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社会组成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¹⁷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对“美”有特殊认知和感受力的民族，则正是在宋代，中华民族第一次在审美观的建构和审美趣味的成熟方面上升到崭新的高度——“韵”这一概念的被广泛运用就是一个标志。此外，中华民族对日常生活审美的建构和提高，也在两宋达到高峰并形成一种新的雅俗共赏的生活方式。由此可以认为，“宋韵”之所以产生于宋代而非其他朝代，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有必然。在今天，我们弘扬“宋韵”文化，当然不能仅仅缅怀那一个逝去的时代及其美丽却哀婉的社会风貌，不能只是限于对“宋韵”的精致高雅给予赞美，而是必须从中寻找“宋韵”之所以为“有宋”之“韵”的根本所在，并且把其中那些过于阴柔、消极的成分剔除，而吸收那些健康仍有生命力的成分并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姜青青：《“宋韵”说》，《杭州日报》2021年8月23日，第5版。

2 陶然：《从人的层面认识宋韵文化》，《浙江日报》2021年10月11日，第7版。

3 徐吉军：《宋韵：登峰造极的两宋文明》，《文化交流》2021年第1期。

4 《加快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浙江日报》2021年9月1日，第1版。

5 《浙江日报》2021年10月26日，第7版。

6 对此可参看孙维城的《宋韵的人文精神及其在宋词中的体现》，《中国韵文学刊》1997年第1期。此外，前引姜青青之文也有简单阐释。

7 如《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又《赞誉》篇中有“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唐代司空图更是以韵评诗，其《二十四诗品》虽然把“雄浑”放在首位，但所分二十四种风格中也只有雄浑、高古、劲健、豪放、悲慨等属于阳刚之列，其他都可归于阴柔范畴，足见他的审美倾向。

8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东方出版中心，1984年，第576、591、581页。

9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00、197-198页。

10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页。

11 李泽厚：《美学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20页。

12 对此笔者撰有《“帝都情结”与“市井风情”的契合——论“宋韵”与宋代话本小说中的“杭州”元素》，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9月29日第15版。

13 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66 页。

14 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300 页。

15 朱熹：《朱子语类》（七）卷一百九，中华书局，1986 年，第 2702 页。

16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第 107 页。

17 转引自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第 108 页。